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

(1847—1917)

(上卷)

高 放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

(1847—1917)

(上卷)

高 放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ZZ17N11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 1847—1917: 全2卷/高放
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5
ISBN 978-7-5613-9960-6

I. ①国… II. ①高… III. ①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史—1847-1917 IV. ①D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6856 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1847—1917)(上、下卷)

GUOJI GONGCHANZHUYI YUNDONG SHIGANG(1847—1917)

高放 著

选题策划	雷永利 张俊胜
责任编辑	张俊胜 杜莎莎
责任校对	王丽敏
封面设计	锦 册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4.5
插 页	8
字 数	600 千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9960-6
定 价	158.00 元(全 2 卷)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高教出版中心联系、调换。
电 话:(029)85303622(传真) 85307826

自序

近七十年来我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并长期从事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工作

今年农历正月初三是我的 90 寿辰，当晚我静心冥思，写下了一首题为《回眸平生 展示晚景》的七言律诗：

英华起步路悠悠，北大逐波挺上游。
投笔从戎终梦断，登坛执教竞评优。
精读宝典深思辨，勤写华章苦探求。
民育薄材兴有用，披肝沥胆谱春秋。

这首诗可以说既回顾了我从高中一年级起七十多年来如何持续不断地、与时俱进地学习、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长期如何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教研工作，又展示了我晚年怎样想撰写一部我七十年来亲身经历和比较熟悉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国际共运史。以下我想分四个部分简要论述我七十年来走过的曲折而终究正直之路。

一、我怎样从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我 1927 年 2 月 4 日（农历正月初三）出生于福州市一个职员之家。我父亲是革命民主主义者，1908 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11 年参加福建省辛亥革命。我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度过的，高唱众多爱国抗日歌曲，参加多种宣传抗日的爱国活动。在学校也是多受抗日爱国教育，同时也多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认为他主张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很好的救国

理论和社会理想。孙中山说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弄不清三民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区别。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是1944年在福州英华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后。暑假里，我从“党外布尔什维克”、自称“钢铁的辩证唯物论者”陈衡庭老师处听到他讲解论理学，实际上是讲辩证唯物论。他还借给我马克思、恩格斯著的《共产党宣言》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我读后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并且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1945—1946年我高中三年级时，又读到邹韬奋写的《萍踪忆语》和《萍踪寄语》，书中记述的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不同情状和鲜明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上我高中二、三年级时创办过级刊和校刊，所以高中毕业时我立志将来要当邹韬奋式的记者。1946年初，我得知进步记者羊枣（杨潮）被国民党政府迫害致死和昆明发生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的“一二·一”惨案，开始痛恨国民党政府的暴政。1946年春天，我还读到黄炎培的《延安归来》，对书中所写延安新社会十分赞赏和向往，当时写了一首诗《从此走向远方》刊登在福州一家日报副刊上。总之，从英华中学起步，我开始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追随中国共产党，追求自由、民主与科学的人生长征之路。这就是我在七言律诗开头所说的“英华起步路悠悠”。

1946年夏天，我在上海考上了北京大学。秋后入学不久就从进步同学处借读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深感比我从小学到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加完善，更切合中国实际。12月底，北大学生带头，掀起了抗议美军暴行（美国兵在圣诞前夜强奸北大女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我积极投入，带领游行队伍高呼“把美国兵赶出中国去！”12月30日晚，我们最要好的6个同学秘密聚会，成立了“十二月社”，传阅并讨论解放区出版的政论与文艺作品，每月在校园内张贴我们分头撰写的“十二月”壁报。1947年，我在清华园买到莫斯科出版的蓝皮精装本《列宁文选》，如饥似渴精心研读，全盘接受。在5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民主运动中我又走在前列，当选罢课委员会5个常委之一。6月底有人介绍我参加民主青年同盟，并且委派我担任北大四院“民青”支部书记，后来我的共青团团龄就从1947年6月算起。这就是七言律诗第二句所述“北大逐波挺上游”，我在学生民主运动中挺进上游。

1947年秋后，我在北大政治系听楼邦彦教授讲政治学概论。用美国教授加纳的英文本做教材，每两周还要交一篇读书报告，我深感太脱离中国实际。我痛恨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贪污腐败，迫害民主运动学生。当时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很想到解放区当随军记者，于是1948年1月25日通过国民党政府的封锁线，投奔晋冀鲁豫解放区献身革命。到边区政府报到时，我深感摆脱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获得自由解放，于是填表时就改名高放（我原名是高元法）。边区政府认为我想投笔从戎其志可嘉，但还是要先到山西潞城北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对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有更多了解后有机会再到前线当随军记者。在解放区的北大文教学院学习不到半年，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个边区就合并为华北解放区，这两个边区的北方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就合并为华北大学，校址设在河北省正定县。1948年8月华北大学成立时我居然被选拔为历史研究室研究生，头半年在著名理论家何干之指导下攻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理论上有很大提高。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初我就随华大队伍回到北京城，提前结束了研究生生活，调任学习助理员（相当于助教），给新考进华大的学员辅导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到解放区后，经过近两年的艰苦生活、学习和工作的锻炼，我的政治觉悟大有提高，原想当无党派记者、当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有根本转变。研究生时我申请加入共产党，经过一年多的考验和考察，终于在1949年12月30日华大即将结束时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我被吸收入党。总之，从1946年底到1949年底，这三年间我经过北京大学、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三所大学的培养，终于由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二、我开始执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多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左”的影响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发出通知，以华大为基础创办新中国第一所文科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3月15日，经人大党委批准，我加入共产党，8月即奉命到新成立的人大马列主义教研室执教。我是当时教研室25位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个（23岁）。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大学本科开设马列主义基础作为

首要的公共政治理论课，马列主义教研室又称首席教研室。马列主义基础课的内容是讲授、学习苏联共产党党史，基本教材是1937年联共（布）党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中概括了从1883年到1937年的历史和经验。1950—1956年，先后有10位苏联专家被派到教研室，帮助我们提高。苏共党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讲苏共党史不能不涉及马克思主义诞生和传播以及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巴黎公社革命等诸多国际共运史的问题。

由于在英华中学就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并且稍有口才和文才的训练，再加上1946—1950年这四年间速成了大学、研究生和助教的培训，所以我自1950年登坛执教后脱颖而出，在教学和研究两方面都表现优异突出。1951年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中，我在全校科学讨论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吸取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教训》，随后连年发表论文。1954年被评为讲师，1956年被评为副教授上报（当时各校评副教授都要上报经教育部批准）。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大事。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发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错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所做的秘密报告震撼了世界。本来我们早就感到马列主义基础课只讲苏共党史，内容过于狭窄，苏共的历史，有许多方面都要追溯到19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1951年我第一篇论文，就从十月革命追溯到1871年巴黎公社镇压反革命的历史。

于是，1956年夏天，我们教研室的同志大都按照党中央和刘少奇的指示，主张把苏共党史扩大改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恰好那年秋后马列主义研究班的马列主义基础分班招收了80多名新学员，预定三年制，任命我为班主任。我就带头拟就了一个国际共运史的教学计划，以国际共运史重大事件为主线，以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经验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初次指导研究生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国际共运史。同时，我还指导资料室的同志选编出版了13本国际共运史学习资料。1958年，我们采取教师与研究班学生合作的方式，60人苦战二十昼夜，赶写出来我国第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作为“大跃进”的产物向国庆节献礼。我参加了这本书的统修。全书共约120万字，分上、下两卷，由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印1000册，供全国高校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参考。这部书稿不仅内容粗糙，而且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主，下卷直写到批判铁托修正主义、大力赞颂人民公社运动。1961年，我国开始由国家统一组织编写文科教材，国际共运史是其中一种，由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组织人大、北大、北师大、湖北大学四校的23人集体编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涵盖马克思主义诞生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段历史。1961年6月至1963年3月分工写出约50万字的初稿，1964年2月印出铅印本送审。我自始至终参与撰稿和统稿。从1960年起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我自己在教学和科研中也受“左”的思想影响越来越重。可是没有料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很快被人大国际政治系的造反派视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进行批判，主要是由于我在1956年6月发表过一篇《列宁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加上我当时表示赞同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造反派给我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好我在“文革”期间没有参与校内两派的激烈斗争，幸免于难。我趁机进一步细读马列著作全集，更坚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1970年人大停办后，我们国际政治系全系合并到北大国政系，我又转到北大教国际共运史。这时更突出受“左”的思想影响，把国际共运史讲成国际共运十次路线斗争史。“文革”中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不断升温，使我越来越忧虑。所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无比欢欣鼓舞，认为我们党大有希望了。1978年8月人大复校，我又回到人大教国际共运史。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大力革新国际共运史的教研工作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我痛定思改。这时我已过知天命之年，终于迎来第二个教研青春。我以沸腾的思想解放和浓烈的青春激情投入新的教研工作。1979年，我开始以新观点讲授国际共运史，同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还在全校科学讨论会上发表题为《反对个人迷信是国际共运史的优良传统》的报告，指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历来反对个人迷信，国际共运史上对领袖的个人迷信是从斯大林搞起的，个人迷信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反对个人迷信是长期的历史任务。

1980年，我又在全校科学讨论会上发表《社会主义国家政体问题的探讨》，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是民主共和政体，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是沙皇君主专制体制的变种，根本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要改革斯大林的这三制，真正实行权力制约制、权力任期制和权力选举制，是长期且艰巨的历史任务。由于这两篇文章当时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对我国的改革事业有重要启迪，所以我于1981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破格以副教授身份评定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这在全国高校中是唯一例外），并且在人大首先建立全国第一个国际共运史专业博士点。1979年和1984年教育部政治思想教育司两次指定我领衔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供全国高校文科开设国际共运史这门课程使用。在这个新编大纲中，我着重纠正了“左”的思想的干扰，改变了“三突出”的弊病（即过分突出路线斗争、领袖作用和经典著作），强调了“三重点”（即要重点反映群众运动、党的领导和总结经验教训）。依据这个教育部审定的教学大纲，80年代我主编了3本适应不同层次要求的教材，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本》（天津人民出版社版）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史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20世纪80—90年代，除国际共运史这门课程外，我还开设过社会主义思想史、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与实践等课程，兼任过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会长、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和副会长。受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委托，我曾主编学术性会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七年（1982—1988）。90年代，人大校内“左”的指导思想回潮，1994年后我拒不再招博士生。这样到1997年我培养了14名博士生，年满70周岁光荣离休。离休后，我在校内没有教学任务，我的母校北大聘请我为讲座教授，外交部机关党校给我发教授聘书，还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天津市委党校、福建省委党校、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宁夏大学等校都给我发各种头衔的教授聘书，于是我把课堂转移到校外，频频到全国各地讲学。同时我在报刊上发表更多文章，着重总结苏联和东欧剧变的深层原因和深刻教训，强调国际

共运要重新搞起来，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出谋献议。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更换党政领导人后经过调查研究，认为1997年让我离休是不恰当的，对学校是个损失，于是经校学术委员会讨论，一致通过返聘我招收博士研究生，于是我又继续培养了9名博士生。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评定我为荣誉教授，2009年又评定我为荣誉一级教授，相当于荣誉院士。今年我已经年满90周岁，又久患糖尿病、心脏病、颈椎病等多种疾病，该退役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主编了三十几部教材、辞书和教研资料，撰写了《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专著，还与友人合著了《普列汉诺夫评传》《普列汉诺夫年谱》《清末立宪史》《历史的丰碑——从马克思主义到邓小平理论》。此外，我将在报刊上发表过的500多万字的文章分门别类，自编出版了10部文集，书名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纵览世界风云》《高放政治学论萃》《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高放自选集》《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

四、晚年精心撰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

我在六十多年教研生涯中开设过多门课程。其中讲授最多、我自己最感兴趣、积累资料最丰富的首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人类社会和自然发展的历史千姿百态，千门万种，其中我深感最重要、最伟大、最壮丽、最深刻的莫过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因为这是人类争取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这是人类争取平等和谐共处、轻松愉快劳动、美满幸福生活的历史，同时这又是充满艰难困苦与曲折变化的历史。我自1947年加入共青团、1950年加入共产党起就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亲身经历了近七十年来国际共运的兴衰成败和跌宕起伏，所以晚年想执笔谱写一部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正好2013年初《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执行主编郭彦英约请我撰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从2013年5月起《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为我开辟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题讲座》专栏，分期连载我撰写的文稿。我想一定要以老共青团员的锐气、老共产党员的修养、老教授的经验

和老学者的积累（包括纸质资料的积累和深层思考的积累）来写好这部独特的历史，这对于资政育人、推进改革开放、普及和深化人们对国际共运史的认识、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展望共产主义的前景，都会有好处的。要写好这部书稿一定要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纠“左”防右，允执厥中；要继承并发扬我国史学家注重史德、史识、史胆的优良传统，并融合运用左丘明《左传》编年体、司马迁《史记》纪传体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三种不同体裁，博采众长，依据史实，善于辨析，精修信史；还要尽力深究历史真相，透视历史内幕，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以期提高历史认识，增进历史智慧，达到以史鉴今、鉴往知来的目的。

我将一百七十年的国际共运史以重大革命组织和重大革命事件为纲，归纳为20个专题，每个专题之中再编写组织机构、会议、文献、群众活动和人物活动等。这些可以说是立纲列目，纲中有目，每个专题都是纲举目张。我新创的这种纲目体裁有助于人们既有系统又有重点地把握并记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全部内容。三年多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已连载11个专题，在读者和国际共运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和热烈评议。该学报已先后发表10位专家的10篇评论文章，普遍认为拙文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从标题到内容新见迭出，观点新颖，史料丰富，结构严密，文笔流畅。今年正好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建一百七十周年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一百周年，承蒙有关专家推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领导赏识，愿意为我出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1847—1917）》这部专著。我把三年来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发表的10个专题整合为本书的10章，重新审读各章内容，并做了仔细的修改和补充。为了平衡全书布局，我在第一、二、三章都增写了一节，同时在前言中增写了国际共运七十年的历史脉络，在结语中增写了国际共运七十年的历史启示，全书增加5万多字。此书内容比起原来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发表的，不仅数量有所扩充，而且质量更大有提高。此书在今年双纪念年整理并准备出版，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书中不当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正。

最后，还要向读者预告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来一百年的国际共运史纲，我拟分为以下10个专题来撰写：

- 第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苦难奠基；
- 第二，第一个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功过参半；
- 第三，世界苏维埃革命运动急起缓落；
- 第四，苏联第一次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速成多弊；
- 第五，各国共产党人投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功勋卓著；
- 第六，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功小过大；
- 第七，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兴衰成败；
- 第八，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两败俱伤；
- 第九，苏联东欧等十一国雪崩式剧变催人深探；
- 第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低谷中探索革新。

上述第一个专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苦难奠基》，已经发表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3、4期。其余9个专题我拟在三年时间内写完，还会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继续连载，然后拟出版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从十月革命胜利到中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1917—2017）》。

习近平同志早在2004年12月23日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讲话中就提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要做到“真”“情”“实”“意”四点要求。“意”即第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第二要对哲学社会科学充满激情，第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第四要树立精品意识。^①我读到这“四字经”的高度概括深受启发。我撰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正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科学为指导，充满对我最热爱、最醉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学科的激情，密切联系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力求写出一部有自己独立见解的精品。至于距离精品的差距，只有依靠众多读者和专家多提意见，我一定精心修改，竭力缩小。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响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此，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他鼓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

^① 详见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262页。

思想之先声”。当今时代，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后起之秀和中流砥柱。成立于1921年7月的中共在国际共运史上按建党时间顺序排名第三十四位，可是比中共还早建立的33个共产党有的已灭亡（如苏共^①），有的已被反动派消灭（如印尼共），有的已自行消亡（如芬兰共），有的已分裂（如印度共），有的已改名换姓（如意共），有的长期边缘化了，还在困境中坚持斗争（如美共）。唯独中共，自建党后只经历二十八年艰苦奋斗就掌握了国家政权，执政六十年来虽经历曲折，然而始终巍然屹立，已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确实是国际共运的后起之秀。当今世界有130多个共产党，共产党员总数约1亿人，其中中共党员8900多万，约占世界共产党员总数的89%。可见中共又是当今国际共运的中流砥柱。^②因此，中共的学者有可能也有责任来撰写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虽然已经年满90周岁，是国际共运史这个学科最年长的老兵，但依然要在风烛暮年竭尽忠诚、克尽绵力，为繁荣国际共运史这个学科做出微薄奉献。正如文首七言律诗末两句所写：“民育薄材兴有用，披肝沥胆谱春秋。”人民培养了我一辈子，我要尽力谱写我亲身经历和熟悉的国际共运史的春秋，来报答人民，并且鼓舞人民继续奋勇前进。正如《国际歌》所高唱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2017年9月3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寓所顶斋

①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简称“俄共”）成立于1990年6月，为当时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俄共被当局禁止活动，组织被解散，财产被没收。1991年底苏联解体，1993年2月，俄共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宣布俄共重建，同年3月在俄联邦司法部获准登记。2005年俄共十一大修订的党章规定，俄共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俄国共产党（布）——全联盟共产党（布）——苏联共产党及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一脉相承，是捍卫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劳动群众利益的党。

② 详见拙文《中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后起之秀和中流砥柱》，载《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期。

前 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七十年的历史脉络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1847—1917）》一书专写从1847年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建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这七十年的历史。全书的历史脉络，我想用一、二、三、四这四个递进的数字来做出简明又便于领会和记忆的概括。这就是“一个科学理论”“两个国际组织”“三个革命政党”和“四个革命高潮”，叠加起来就是全书的10章内容。

所谓“一个科学理论”，是指全书第一章开宗明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科学第一次应运诞生”。马克思主义科学指明了无产阶级要完成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达到每一个人的解放这个历史使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掌握政权，进而依靠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始至终的指路明灯。要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产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体系和内在联系，要理清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哲学是根本，经济学是基础，社会主义学、共产主义学是核心。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是比哲学更直接、比经济学更全面指导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首要科学。当今，我们要与时俱进地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顾

名思义理应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由社会出主义，靠社会显主义，而不能只以一党为主义，只为国家而主义，只由领导出主义，只靠媒体显主义。“共产主义”一词理应更精准地理解为公共主义。公共主义表明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并不限于把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归社会公共占有，更重要的是要管好公共资产，增加公共产品，力谋公共福利，发展公共事业，扩大公共服务，增加公共享用，完善公共选举，厉行公共决策，加强公共治理，维护公共权益，严密公共监督，提高公共理性，弘扬公共精神，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造福公共大众。公共主义越发展，就是共产主义因素增加越多。人类社会就是这样逐步发展到共产主义。

所谓“两个国际组织”，是指1864—1876年的第一国际（全称为“国际工人协会”）和1889—1914年的第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与众多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人都认为，应在国际范围把各国先进工人组织起来，为争取工人阶级权益而开展斗争，进而促进成立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为夺取政权、实现工人阶级解放而斗争。于是在1864年欧美工人运动高潮中组建了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第一国际存在十二年，召开过6次代表大会、3次代表会议，做出了一系列决议，在欧、美、非三大洲18国建立有分支机构，拥有大约100万会员。第一国际为争取工人权益、支援民族独立运动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为克服工人运动中多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做出了重大贡献，最终在1876年欧美工运低潮中被迫自行解散。事隔十三年，即1889年当欧美社会主义运动重新高涨时，又成立了第二国际，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的第二个国际组织。比之第一国际，它的新特点是：欧美多国已经建立了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国际成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先后加入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政党达30个，拥有300多万党员。第二国际先后召开过9次代表大会，做出众多决议，有力地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1889年决定每年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1910年决定每年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这两大节日都是第二国际留下的不朽的精神遗产。后因修正主义和沙文主义泛滥，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在政治上破产，组织上瓦解。

所谓“三个革命政党”，是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其支部分布在欧美八国，只有近400名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只召开过2次代表大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共产党宣言》就是它的党纲。它积极参与了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革命失败后，于1852年被迫解散。第二个革命政党是德国社会主义政党。最早成立的是1863年的全德工人联合会，1869年又创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5年两者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又改名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党是最早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最强大、最有成就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政党。它到1913年拥有党员982850人，在议会中拥有111个席位，占议员总数的28%。党主办几十种合法报刊，拥有200万工会会员支持，还建立有妇女组织、青年组织。然而合法斗争的重大成就使党内滋生了合法主义、修正主义，德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又滋长了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所以这个党在1914年8月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关键时刻，转而支持德国资产阶级政府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标志着这个革命政党的背叛。第三个革命政党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898年俄国成立社会民主工党后遭到沙皇专制政府镇压，1903年在外国重新建党，党内当即形成名为布尔什维克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是俄文音译，意为多数）和名为孟什维克的少数派（孟什维克在俄文中意为少数）。这两派实际上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区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主张：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开展革命活动必须建立集中统一领导，有严格纪律

的秘密政党，善于将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在俄国首先要依靠工农联盟进行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专制政府，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然后再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作为特殊类型的革命政党在俄国异军突起。后来俄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

所谓“四个革命高潮”，即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和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1847年6月，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建，八个月后，即1848年2月就迎来欧洲1848年革命。这次欧洲革命巨浪源自2月法国巴黎人民起义，起义迅即推翻奥尔良王朝，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革命浪潮迅即波及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匈牙利、波兰、希腊等18国，可以说是全欧性空前未有的大革命。革命原因主要是封建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压迫，所以这次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并不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这次革命是发生在欧洲多国已有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工人阶级已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第一个共产党刚刚建立的新历史条件下，所以，这次革命不能不深深打上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烙印。广大巴黎工人参加了2月人民起义，革命胜利后，工人当然要求满足自己参政和就业的自由民主权利。资产阶级政府不断打压工人的正当要求，巴黎工人被迫于6月举行武装起义，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第一次革命。自发的起义由于缺乏正确的坚强的领导和敌我力量悬殊，只战斗四天就失败了！3月德国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就率领300多名共产党人从国外赶回祖国投身革命。共产党人提出了自己关于民主革命的斗争纲领，在科隆市创办了《新莱茵报》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号召并组织各地工人和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因革命力量过于单薄，德国的民主革命到1849年3月也被镇压下去了。欧洲1848年革命只经历一年又九个月都失败了，但是这次欧洲革命使新